

二十世纪以来瑶语（勉语）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孙叶林

（衡阳师范学院 中文系，湖南 衡阳 421008；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二十世纪以来的瑶语（勉语）研究，经历了拓荒、普查、沉寂、繁盛、延展五个阶段。在瑶语（勉语）的分布概况、历时演变、语音、词汇、语法以及语言接触与比较等领域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今后应在田野普查、单点深入、方法创新等方面加强研究。

关键词：20世纪；瑶语（勉语）；民族语言

中图分类号：H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313(2010)05-0110-07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不仅民族成分多，而且语言文字的种类丰富复杂。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复杂的、多源的、稳定的少数民族，瑶族主要分布我国南方广西、湖南、贵州、云南、广东、江西等省区的140多个县市，人口213万多；其中广西瑶族分布最广人口最多，湖南次之；“大分散，小集中，大杂居，小聚居”是其主要居住特征。国外的瑶族，其根在中国，散居在东南亚的泰国、缅甸、老挝以及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约有35万人^[1]。瑶族居住的地方，多是崇山峻岭的山区，因此被称为“山地民族”。

瑶族有自己的语言，其语言只有声音而没有文字，并以它为主要交际工具。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多种因素促使瑶族语言形成了多源和多语种的特征，其语言的丰富性在我国民族语言中非常突出。根据自称，瑶族语言大致可分为六种语言，它们是：勉语，属苗瑶语族瑶语支；布努语，属苗瑶语族苗语支；巴哼语，属苗瑶语族苗语支；炯奈语，属苗瑶语族苗语支；优诺语，属苗瑶语族苗语支；拉珈语，属壮侗语族侗水语支。这六种语言都属于汉藏语系，分属于两个语族三个语支。其中勉语是瑶语的代表，它属于典型的瑶语支语言，所以一般意义上所说的瑶语就是指勉语，国内的瑶语研究也主要就是指勉语研究^[2]。

一 瑶语（勉语）研究的阶段及成绩

我国现代意义上语言学科的建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步的，作为分支学科，民族语言的研究则起步更晚。历史上，未见文献记载有对“小语种”瑶语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瑶语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至今约有90余年历史。90余年来，在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下，瑶语研究逐步展开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下文按照历史进程，把20世纪以来的瑶语研究划为四个阶段：

（一）拓荒期（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

1928年4月，蔡元培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创办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他亲任民族学组主任，正式树立起民族学的大旗，也开启了民族语言研究的先河。民族学组确定了首批六个重点研究课题，“广西凌云瑶族的调查及研究”被列入其中。同年8月，学者颜复礼、商承祖到广西凌云县北部6个瑶族村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拍摄了大量照片，记录了当地被称为红头瑶、蓝靛瑶、盘古瑶、长发瑶的生活习俗和语言，其成果《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1929年出版。尽管该报告重照片而轻资料与分析，故而显得疏漏简单，但这是国内首次瑶语的调查与研究，开拓

收稿日期：2010-09-0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9YJA740038），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立项课题（0806025B）。

作者简介：孙叶林（1970—），女，湖南邵东人，副教授，博士生，从事汉语方言与民族语言的接触与影响研究。

之功不可磨灭。

国内学者用音标记录研究瑶语则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重要成果有李方桂的《广西凌云瑶歌》和赵元任的《广西瑶歌记音》，两书均采用国际音标记音，都于 1930 年出版，为国内瑶语研究的开山之作。其中《广西瑶歌记音》是一本从语言学方面来研究瑶歌的专著，记录了 197 首当时中山大学生物系学生石声汉在广西瑶山调查搜集到的瑶族民歌，并用《切韵》与瑶歌进行了比较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许多高等院校和研究机关纷纷迁到内地，其中有一部分学校地处瑶族聚居区，部分学者继续进行瑶语研究。主要成果有：黄锡凌《油岭方言的描述》（《岭南学报》1939/18）、唐兆民《大藤山瑶族名类之探讨》（《文化》1941）、杨成志《瑶语小纪》（《民俗》1943/1-2）等。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内战等原因，瑶族研究处于停顿状态。但仍有坚持者，其中张琨《苗瑶语声调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16 本，1947）一文影响较大。文中根据 10 个点的声调对应和鼻闭塞音声母的分化，推断古苗瑶语和古汉语声调一样有“四声八类”，“四声”指“平声、上声、去声、入声”，“八类”指四个是阴调，四个是阳调。阴阳调的分立是依据声母来源的清浊分的^[3]。

总之，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的瑶语研究建立在田野调查基础之上，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语料，为建国后开展瑶语研究提供了可贵的线索和可供比较的材料，并奠定了基础。

（二）普查期（20 世纪 50 年代初至 60 年代初）

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国家对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极为重视，明确规定了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权利。1951 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还具体规定：“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帮助文字不完善的民族逐渐充实其文字。”国家建立了专门机构组织开展民族语言的普查工作。1956 年，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建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筹备处）和中央民族学院共同开办了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训练班，培养了一批语言普查工作专业人员。1956 年 12 月，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瑶语分队在马学良、严学窘、罗季光和王辅世等专家们的指导下，对滇、黔、湘、粤、桂的瑶族语言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调查。此次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共调查了近 50 个主点、30 多个副点和 70 多

个参考点，调查点覆盖瑶族地区的面极宽，调查到的原始资料数百万字，对于全面了解瑶族语言和方言土语的分布情况起了重要作用^[4]。

作为普查成果，这期间产出了一批重要成果。主要有：罗季光《广西瑶语》（《中国语文》1953/3）、胡起望的《盘瓠语的“巧话”》（《中国语文》1957）、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瑶语调查组编印《瑶族的语言情况和文字问题》（1958）、卢诒常《瑶族勉语标敏方言的构词变调与构形变调》（《民族语文》1958/6）、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苗瑶语族部分》（科学出版社 1959）、〔英国〕唐纳、贺嘉善《瑶语勉方言中的汉语借词的层次》（《汉藏语系语言学论文集》1961）；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语言研究所《汉语在瑶族语言发展中的作用》（《中国语文》1961/10~11）、毛宗武、周祖瑶《瑶族语言概况》（《中国语文》1962/3）、盘承乾、邓方贵、刘保元著《瑶语》（广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印 1963）等。《汉语在瑶族语言发展中的作用》一文运用丰富的语言事实说明汉语对瑶语所产生的影响，作者所提出的借词有时间层次及基本词汇中的词在一定情况下也可被借词所替代等观点，对民族语言的研究与汉语研究都有启发意义。《瑶族语言概况》首次把复杂的瑶族语言概貌简要地介绍给国内外读者。另外，这期间也有一些国外学者关注瑶语研究，如欧德里古尔《苗瑶语历史语言学导论》（法国《远东研究院报》1947~1950）；〔英国〕唐纳《高地瑶语词的语音》（《东方非洲研究所学报》第 24 卷，1961）等。

上述调查和研究一方面大致廓清了中国瑶族语言的分布范围和基本特征；另一方面从语言归属上逐步分清了“瑶族语言”和“瑶语”这两个学术概念，即“瑶族语言”是数种瑶话的统称，而“瑶语”则指的是“勉”话，从而把瑶族语言的研究与瑶族社会历史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为瑶语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三）沉寂期（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末）

瑶语研究的道路并不是一路坦途。自 60 年代中期到 1977 年，由于“左”的思想干扰，国内瑶语研究受到很大损失：错误地把很多民族语言研究人员、专家、教授看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混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界限，夸大了语言融合、以汉语言取代民族语言的趋势，正常的民族语言研究工作受到极大的影响。不仅仅是瑶语，全国的民族语言研究都转入低潮，甚至全面停滞。倒

是在国外,美国康乃尔大学1968年出版了〔美国〕隆巴德·珀尔内著的《瑶英词典》一书。

(四) 繁盛期(20世纪80年代初~20世纪末)

经过拨乱反正,在解放思想的浪潮下,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民族语言政策得到落实,民族语言事业蓬勃发展。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民族研究所正式归制(2002年更名为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1979年,中国民族语言学会正式成立,《民族语文》杂志创刊。瑶语研究走上了繁盛的时期,取得了大量实绩性的成果。

1 著作方面。主要有: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毛宗武等编著《瑶族语言简志》(民族出版社)得以正式出版。作为普查期的重要成果,该著作主要以我国最大的瑶族分布区——广西为代表语言点,对瑶族语言的三种主要类型“勉语”、“布努语”和“拉伽语”的语音系统、构词方式和语法要点进行了描写,并简要论述了瑶族语言和其他语言的关系。1984年10月,中央民族学院编印了由邓方贵、盘承乾、房亚木、刘保元等编《瑶语》。1987年,中央民族学院苗瑶语研究室编印了《苗瑶语方言词汇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其中瑶语词汇部分,同样是以广西瑶语为代表。1989年,巢宗祺、余伟文的《连南八排瑶语》(中山大学出版社)全面分析了粤北山区连南八排瑶语的语音系统,词语表和语法例句。1990年,巢宗祺的《广东连南油岭八排瑶语言概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全面分析了油岭八排瑶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并对排瑶语言进行了比较分析。1991年,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民族出版社)中的苗瑶语篇对苗瑶语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1992年,毛宗武主编《汉瑶词典》(四川民族出版社)从词汇这一“底层物质”出发为瑶语研究提供了一批比较完整的勉语资料。1992年,舒化龙的《现代瑶语研究》(广西民族出版社)从谱系方面区别了几种瑶族语言的关系,明确提出现代瑶语是以“勉”语为代称的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瑶语支语言,同时通过多层次的比较,显现了现代瑶语各方言发展的不平衡性。1992年,戴庆厦主编《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关系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中专设《汉语与苗瑶语族的亲属关系》一章探讨汉语与苗瑶语族的亲属关系问题。1995年,王辅世、毛宗武的《苗瑶语古音构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运用“取其语音对应中方音差异的最小公倍数而略其所当略”的方法,从23个点的材料构拟出263类古苗瑶语的声类、210个韵类,为后继者的工作打开了方便之

门。1997年,中央民族大学的盘承乾、卓小清根据广西来宾县勉语编写了《瑶语文》一书。1998年,戴庆厦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书海出版社)一书中的第一章第二节“苗瑶语族语言研究”对20世纪国内外苗瑶语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的梳理。

2 论文方面。据不完全统计,在这20年中,在国家级和省级刊物上发表瑶语研究的论文有60多篇,是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可相比的。这些论文涉及瑶语研究的各方面:

(1) 瑶语概况研究。主要有:张济民、徐志森《贵州瑶族的语言》(《贵州民族研究》1983/3)、余伟文、巢宗祺《油岭瑶话概述》(《中山大学学报》1984/3)、徐志森《荔波瑶族语调查报告》(《贵州民族调查》1984/2)、王均《广西龙胜红瑶的优念话》(《罗常培纪念文集》商务印书馆出版1984)、毛宗武《我国苗瑶语族语言研究概况》(《民族研究动态》1985)、赵建伟《中国瑶语研究述评》(《瑶族研究论文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黄盛全《金秀瑶族支系概述》(《中南民族大学学报》1987/1)、蒙朝吉《50年代的瑶语大普查》(《广西民族研究》1999/1)等,文章多有对单点的瑶语概况进行描写,也有对整个苗瑶语的概况及研究进行梳理分析。

(2) 瑶语系属及方言分类研究。主要有:石光树《试论苗、瑶、畲三族的渊源关系》(《贵州民族研究》1983/2)、龙耀明《那溪瑶语与侗语的关系》(《贵州民族研究》1984/3)、王辅世《苗瑶语系属问题初探》(《民族语文》1986/1)、盘承乾《论瑶语方言》(《瑶族研究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88)、刘保元的《略论拉伽语与侗语的关系——兼与‘茶山瑶是操侗语的’论者商榷》(《瑶族研究论文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刘保元的《论瑶族拉伽语的系属》(《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5)、赵春金《瑶语与汉语的底层关系》(《瑶族研究》第3辑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黄行《苗瑶语方言亲疏关系的计量分析》(《民族语文》1999/3)等。这些论文各有侧重,其中《苗瑶语系属问题初探》一文,用大量语料证明驳倒了苗瑶语属于孟高棉语族和澳台语系的结论,认为与汉语有密切关系,有和汉语完全相同的声调系统,词的结合、语法现象和汉语极为相似,苗瑶语应属于汉藏语系,这一结论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可。

(3) 瑶语语音专题研究。又可细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语音内部结构规律的静态描写分析,

即描写语言学的有:李珏伟《贵州瑶麓瑶语音位系统》(《贵州民族研究》1983/3)、〔美国〕赫伯特·C·珀内尔著、李增贵译《泰国瑶语音系》(《民族研究集刊》1985/2)、蒙朝吉《瑶族布努话连续变调问题初探》(《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5/1)、卢治常《瑶族勉话标敏方言的构词变调与构形变调》(《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5/6)、周祖瑶《瑶族勉语的复辅音 PL、KL》(《广西民族研究》1986/1)、郑宗泽《勉语的全浊声母与阴调》(《瑶族研究论文集》广西民族出版社 1987)、〔美国〕赫伯特·C·珀内尔的《‘优勉’瑶民间歌谣的韵律结构》(《瑶族研究论文集》广西民族出版社 1987)、房亚水的《浅谈八排瑶语变调问题》(《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8/1)、陈其光《苗瑶语族语言的几种调变》(《民族语文》1989/5)、黄行《广西龙胜勉语的语音变异》(《民族语文》1990/1)、张琨《瑶语入声字》(《民族语文》1992/3)、盘承乾《瑶语语音初步比较》(《瑶族研究论文集》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2)、唐永亮《瑶族勉语六冲标漫话语音特点和声调实验研究》(《民族语文》1994/5)、李炳泽《苗瑶语辅音前缀的音节化和实词化及其变体研究》(《民族语文》1994/5)、黄权贵《广南那烘村瑶族门话的语音系统》(《瑶族文化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6)、李炳泽《瑶语复合词前音节的前缀化倾向》(《语言研究》1999/1)、黄行《语音对应规律的计量研究方法——苗瑶语方言语音对应规律示例》(《语言研究》1999/6)等。这些论文或有对单点瑶语内部音韵系统详细分析,或有从整体瑶语出发,研究某一类语音现象。其中变调现象是研究得最多的。

第二,历时演变规律的探讨,即历史语言学的有:陈其光《苗瑶语入声的发展》(《民族语文》1979/1)、蒙朝吉《瑶族布努语 1 至 4 调的形成和发展》(《民族语文》1983/2)、邓方贵《现代瑶语浊声母的来源》(《民族语文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1983)、盘承乾《论苗瑶语辅音韵尾的演变问题》(《民族语文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1983)、陈其光《古苗瑶语鼻冠闭塞音声母在现代方言中反映形式的类型》(《民族语文》1984/5)、《苗瑶语浊声母的演变》(《语言研究》1985/2)、《苗瑶语鼻音韵尾的演变》(《民族语文》1988/6)、毛振林《平地瑶话‘见、溪、群’三母的分化》(《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6)、郑宗泽《大坪江勉话边音和边擦音来源》(《民族语文》1990/5)、赵春金《瑶族勉语复辅音的演变》(《民族语文研究新探》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2)、方炳翰的《云南

金平红头瑶话几组声母的历史演变初探》(《民族语文》1992/2)、张琨《古苗瑶语鼻音声母字在现代苗语方言中的演变》(《民族语文》1995/4)、石林与黄勇的《论汉藏语系语言塞音韵尾的发展演变》(《民族语文》1997/6)第二部分分析了苗瑶语塞音韵尾的演变、〔日本〕田口善久的《勉语边音的来源及演变》(《瑶学研究》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7)等。这些论文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角度探讨瑶语某一类语音现象的演变如入声、鼻冠闭塞音声母、浊声母、复辅音、鼻音韵尾等的演变;有的研究有特色的单个语音演变,如边音的演变。

第三,瑶语古音构拟方面有:〔英国〕唐纳《原始苗瑶语构拟中的问题》(译文载《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第 7 集 1986)、陈其光《苗瑶语鼻闭塞音声母的构拟问题》(《民族语文》1998/3)。前文对整体苗瑶语的构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后文挑战《苗瑶语古音构拟》,运用多个瑶语点的现代读音构拟了“鼻闭塞音声母”的状况。

还有一些涉及瑶语语音比较研究的论文,主要有李增贵《中外瑶语音系比较》(《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3/3)、盘承乾《瑶语语音初步比较》(《瑶族研究论文集》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2)等。

(4) 瑶语词汇研究。主要有:李增贵《试说瑶语的‘勉’》(《民族语文》1981/1)、陈其光《汉语苗瑶语同源例证》(《民族语文》1981/2)、舒肖《也谈瑶语的‘勉’》(《民族语文》1982/1);〔美国〕小赫伯特·C·珀内尔著、李增贵译《瑶语的数字》(《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2/4)、傅懋勳《民族语言调查研究讲话(二十)》(《民族语文》1986/5,文中描写了苗瑶语族语言的词类)、曹翠云《汉、苗、瑶语第三人称代词的来源》(《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5)、王远新《苗瑶语族语言词汇研究综述》(《云南民族语文》1992/3)、1993 年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瑶族研究》第 3 辑发表舒化龙、肖淑琴的《略谈瑶族的语言称谓》、〔泰国〕提拉攀·罗——通堪的《瑶(勉)语对于色彩的称呼》等。上述论文有对瑶语词汇整体研究的概述,有对瑶语某些特色词来源的考证。

(5) 瑶语语法研究。主要有:李增贵《瑶语数词综述》(广西民族学院《建院三十周年论文集》1982)、陈其光《苗瑶语前缀》(《民族语文》1983/1)、舒化龙与肖淑琴《瑶语数词初探》(《民族语文》1984/2);周祖瑶《瑶族布努话的量词》(《贵州民族研究》1984/3)、李增贵《中外瑶语的前加成分》(《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5/1)、盘承乾、邓方贵《瑶语构词中的几个特点》(《广西民

族学院学报》1985/1)、邓方贵的《瑶语标敏话的形名词和形动词》(《瑶族研究论文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舒化龙与肖淑琴《盘瑶语构词法》(《瑶族研究论文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傅懋勳《民族语言调查研究讲话(二十八)》(《民族语文》1988/1,文中描述了勉语的句法)、李敬忠《八排瑶语的数词》(《贵州民族研究》1988/4)、卓小清《瑶语的“ta: i2(来)”和“mi 𐌎(去)”》(《民族教育研究》1999/1)等,这些论文,有的是对瑶语的语法做总体的概述描写,有的是详尽描写某一词用法及特征,如对“来”、“去”的分析等。

(6) 瑶语比较研究的有:徐仁瑶《茶山瑶语与侗语的比较研究》(《茶山瑶研究文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

(7) 瑶语应用研究的有:盘承乾《瑶族使用双语和多语制略述》(《民族论坛》1987/1)、李增贵《试论瑶文的词儿连写问题》(《瑶族研究论文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舒化龙、肖淑琴《论瑶文的创新与推行》(《瑶族研究论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越南〕赵有理的《瑶族使用汉字及改造、创制的文字》(《瑶族研究》第3辑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莫纪德《山区瑶族小学“一文三语”教学浅谈》(《中国民族教育》1995/4,文章对瑶文的文字创制、词的书写以及语言教学等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黄权贵《瑶族的书面语及其文字初探》(《瑶族文化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等。这些研究服从并服务于国家语言规划的需要。

(8) 瑶语社会语言学研究,这里所指的社会语言学,主要是指研究语言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如社会因素对语言结构、语言功能的影响引起的变异,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等等。主要有:赵春金《论瑶文对繁荣瑶族文化的作用》(《瑶族研究论文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毛振林《从现代苗瑶语的共时差异看苗族和瑶族的历史分化》(《贵州民族研究》1988/3)、刘保元《瑶族称谓管探》(《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2)、李炳译《从苗瑶语和孟高棉语的关系词说濮人南迁》(《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1)、赵友敬《瑶族的“凿壁探婚”》(《中国民族》1999/1)等。瑶语无文字,一切文化是靠语言承传的,语言是瑶族传统文化的载体。1980年代起,很多学者凭借瑶族语言的研究来探讨瑶族传统文化,拉开了瑶语语言文化学的序幕,拓宽了研究领域,显示了瑶语研究的文化价值。当然,由于这门语言学中的分支学科

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末,70年代后期才传入我国,国内少数民族语言领域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是80年代初期才有所发展。所以瑶语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还有待于开拓和加强^[5]。

总之,经过20世纪最后20年的努力,这一时期瑶语研究可谓是百花齐放,出现了一个良好的研究态势,特别是老一辈瑶语研究者们如傅懋勳、盘承乾、毛宗武、张琨、陈其光等人的辛勤笔耕,使瑶语研究得以持续稳固的发展。

(五) 延展期(21世纪以来)

进入新的世纪,瑶语研究在全面铺开的良好形势下继续前行。

专著主要有毛宗武的《瑶族勉语方言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全书57万字,对勉语方言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描写了22个方言土语的语音系统,比较各方言土语的异同,提出了划分瑶语方言土语的根据。

这期间单篇研究文章数量不小,从内容来看,主要还是语音、词汇两大范畴。

第一,语音方面的研究。主要有:袁明军《汉语苗瑶语阳声韵深层对应试探》(《民族语文》2000/2)、2000年《贵州民族研究》第1期发表李云兵的《苗瑶语语音的基本理论和现实研究》;2003年《语言研究》第3期发表金理新的《构词前缀~*m-与苗瑶语的鼻冠音》;2005年《民族语文》第2期发表田口善久的《三江史门勉语的音韵特点》;2006年《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发表黄梅芬的《浅议现代瑶族勉语语音变化的原因》;2007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发表谭晓平的《勉语早期汉语借词全浊声母探源》;2007年《语言研究》第3期发表金理新的《苗瑶语的阴声韵母系统》;2007年《社会科学家》第2期发表张艳的《“牙”的汉语及苗瑶语古音构拟》;2008年《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发表胡晓东的《上古汉语部分“来”母字在苗瑶语中的对应》;2008年《民族语文》第1期发表赵敏兰《瑶语早期汉语借词的声母》;2009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发表谭晓平的《论苗瑶语古汉语借词的调类对应》等。论文多对瑶语语音进行了探源研究。

第二,词汇方面的研究。主要有:陈其光《苗瑶语词汇发展的一种方式》(《民族语文》2000/3)、丁崇明《汉语、藏缅语、侗台语、苗瑶语复合式合成词比较》(《思想战线》2002/5)、吴安其《苗瑶语核心词的词源关系》(《民族语文》2002/4)、潘悟云《从几个词语讨论苗瑶语与汉藏语的关系》(《语言研究》2007/2)、金理新《借词

的形式判别标准——以苗瑶语中的汉语借词为例》（《民族语文》2008/5）、赵敏兰《试论中泰两国瑶语的词汇差异》（《暨南学报》2008/1）等。《苗瑶语词汇发展的一种方式》一文提出了苗瑶语词汇发展的新方式——裂变，即苗瑶语里的一些基本词分裂成了几个不同的词，词分裂以后，原词语音不变，但只表示原来的部分意义，另一部分意义则用新的语音表示。这种原有意义与新的语音结合而成的词称为裂变词。

另外关于瑶语系属探讨的有：邓晓华、王士元《苗瑶语族语言亲缘关系的计量研究》（《中国语文》2003/3）、胡晓东《苗瑶语的早期来源及其系属》（《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9/5）等。

其他如赵敏兰《拓山勉话概况》（《民族语文》2004/1）、李云兵《苗瑶语的非分析形态及其类型学意义》（《民族语文》2006/2）、李云兵《论苗瑶语名词范畴化手段的类型》（《民族语文》2007/1）等也是这一时期重要的瑶语研究论文。

同时，瑶语和汉语的接触研究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注意，如李星辉博士学位论文《湘南土话与湘南瑶语的接触和影响——江华县个案调查研究》（2004）、谭晓平博士学位论文《江永勉语与汉语的接触与演变》（2008）以及蒋军凤硕士学位论文《湘南榴星土话和榴星瑶话的比较》（2002）等。一批专门从事语言学研究的硕士、博士加入到新世纪瑶语研究队伍，他们带来不少新方法和新思路，给瑶语研究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二、瑶语研究的展望

在当前国内语言学界，民族语言研究方兴未艾。瑶语研究是个迷人的园地，虽然近些年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仍有许多问题急待着人们去解决，必须在已取得的成果基础上拓展思路，运用新的理论、方法，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多方位、多层次的研究。笔者认为今后瑶语研究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来推动：

（一）开展新世纪新一轮的瑶语大普查。瑶族主要分布在广西、湖南、广东等100多个县市，相应地形成了100多个瑶族语言点。瑶语的代表勉语内部，又存在着各自不等的差异^[1]。从历史上看，瑶族语言从未有人作过全面而系统的调查，到了三十年代后，著名的语言学赵元任、李方桂和张琨才先后对瑶族语言作过一些局部的调查研究。到了解放初期，罗季光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派出的广西工作队瑶语组的名义，独自一人到广西大瑶山、兴安、荔浦、蒙山、富钟（富川和钟

山）、凌乐（凌云和乐业）、南丹、睦边（那坡）等县进行实地调查，收集了一些瑶族语言材料。50年代全国瑶族语言大普查中，共调查了近50个主点、30多个副点和70多个参考点，调查点覆盖瑶族地区的面极宽，但是，目前这些宝贵的瑶族语言词汇材料尚未系统地汇编成瑶族语言和方言词汇集，况且当时的瑶族语言普查的时间紧、任务重，技术条件与学术水准远不如今，且时间过去半个世纪，瑶语的面貌可能已经发生较大的变化。“今音必有古音”，语言是社会现象，不同地点的语言发展往往不平衡，有快有慢，共时结构里往往蕴含着语言的历时变化。如20世纪50年代收集到的苗语罗泊河方言材料证实了张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苗瑶语八声源于古代四声的论点。因此，要全面系统地了解瑶语的真实情况，很有必要开展新一轮的田野大普查。

（二）进一步加强微观的单点瑶语的深入调查和研究。目前瑶语研究，除了《瑶族勉语方言研究》涉及了22个瑶语点外，众多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广西龙胜、金秀，广东的连南、云南的金平等不足10个方言点，还有许多的瑶语点为尚待开发的处女地。瑶族大分散、小聚居特点决定了不同瑶语点在各方面因素作用下其语言存在各自不等的差异，加强单点瑶语的深入调查研究无疑将有助于促进整个瑶族语言面上的研究。另外，由于瑶语已经属于活力降低，显示濒危特征的语言^[6]，因此广泛加强单点瑶语的调查研究，还能起到抢救性保护瑶语的作用。

（三）大力增强语法、词汇和语义的描写与研究。20世纪以来的瑶语研究主要领域为语音研究，语法的研究在近20余年才有所加强；且在现有词汇研究的文章中，一般描述的是由于语言接触，引起词汇借用的现象。词频、词义演变等方面的研究基本上熟语空白；至于全面描述瑶语的语法系统和词汇系统、语义特点的专著或论文尚没出现。因此，瑶语语法、词汇和语义的描写与研究仍需继续深入，从而更好更全面地揭示了瑶语语法范畴的构成和语法意义、语法形式的多样性。

（四）瑶语和汉语的接触与比较研究应受重视。在各民族接触频繁、语言趋同背景下，语言接触与语言比较，是当前语言学研究的重点。不少学者们开始意识到，汉语方言研究中有很多重要问题必须联系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来考察。某些语言特点在汉语里是隐性的，而在少数民族语言里则是显性的。现代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接触中出现的语言现象可以互证和构拟汉语史的历史。

史发展过程。苗瑶民族同中国南方民族特别是汉语亲密共存了数千年,相互之间一定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如某些瑶语方言 50% 以上的词汇是汉语借词,瑶族在其他文化方面也高度汉化,那么,到底影响程度如何?其影响的机制是什么?目前关于瑶语和汉语接触与比较的研究成果并不多。一些青年学者开始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如孙叶林正在从事的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资助项目“湘南双语区瑶语与汉语方言(赣语)接触研究——以湖南衡阳常宁塔山瑶族乡为个案”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五)要充分利用自然科学手段进行民族语言研究。尽管实验语音学早在 20 世纪初就开始兴起,而且这一方法使语音的描写研究进入了一个更加科学的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历史时期,但国内瑶语研究使用该方法较晚。目前看到的有唐永亮《瑶族勉语六冲标曼话语音特点和声调实验研究》(《民族语文》1994/5)一文。1995 年民族研究所黄行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苗瑶语言的计量研究”,采用语言一种和语料库语言学相结合的新兴语言研究方法即语言的计量研究,对 14 种有代表性的苗瑶语方言的词汇语音项做了定性和定

量的描写、比较研究。随着科学的进步,语言研究者已经可以利用声学实验装置、X 光电影照相、肌电测试仪,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等来进行语言的实验研究,可以大大地弥补了作为“口耳之说”的传统语言学研究方法的不足。可以预见,加强对相关学科研究手段的借鉴,吸收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必将拓宽瑶语研究的广度,促使瑶语研究向深度掘进。

参考文献:

- [1] 舒化龙. 现代瑶语研究[M]. 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2: 1, 2.
- [2] 毛宗武. 瑶族勉语方言研究[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4: 5-6.
- [3] 戴庆厦. 二十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M]. 太原: 书海出版社, 1998: 100.
- [4] 蒙朝吉. 五十年代的瑶语大普查[J]. 广西民族研究, 1999 (1): 62.
- [5] 覃乃昌. 20 世纪的瑶学研究[J]. 广西民族研究, 2003 (1): 55-67.
- [6] 孙宏开.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排序研究[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06 (5): 8-9.

Yao Language (Mian Language) Research Review and Prospects since the Twentieth Century

SUN Ye-lin

(Chinese Department,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Hunan 421008;
Liberal Art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ing about Yao language (Mian language) experienced a pioneering census, quiet, prosperous, to extend the five stages since the twentieth century. Made a lot of achievements in the distribution, evolution, voice, vocabulary, grammar and language contact about the Yao language (Mian language). We should strengthen researching in the field of surveying, single-point studying innovation of method in future.

Key words: The 20th century; Yao language (Mian language); national language